

思维模式对汉语和英语的影响

俞 珏

(安徽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其思维模式迥然不同。汉民族重直觉悟性思维,英语民族则偏逻辑理性思维,不同的思维模式深刻地影响着各自的语言。本文初步探讨了中西方两种思维模式的成因,从字形、词汇、句法、篇章四个层面对比了两种思维模式对汉语和英语语言表达形式的影响。以期对理解汉英不同的语言现象有所裨益。

关键词: 思维模式;影响;汉语和英语;悟性思维;理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 H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63(2005)04-0131-04

The Impact of Thought Patterns on Chinese and English

YU Ju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Abstract: Language is the dress of thought. Thought pattern of China is quite distinct from that of the West because of different cultures to which they belong. The Chinese adopt a thought pattern of intuition and understanding while the Englishmen follow a thought pattern of logic and reason, which makes a profound impact on each language.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tentative causes of formation of the two thought patterns and the impact of thought patterns on Chinese and English, making comparisons between them from morphological level, lexical level, syntactic level and textual level, in order to help one understand better some linguistic phenomena of the two languages.

Key words: thought patterns; impact; Chinese and English; thought patterns of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

一、汉英两种思维模式成因初探

哲学有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即理性思维与悟性思维。^[1]前者是西方的思维模式,后者是东方的思维模式。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并存是因为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初始思维模式一经确立为传统,就会影响整个后世理论。至于初始思维模式是怎样产生的,这点很像语言的起源,往往难以完全说清楚。有种思维模式起源的假说认为:人类天生具备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像普通语法一样天生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后来由于外部世界的某种特定刺激,东方形成了重直觉的悟性思维,而西方发展成了偏逻辑的理性思维。这两种思维模式成形后在各自的文化里不断巩固,最终确立下来成为

传统。

中国最古老的《周易》采取的是意象表达方式,为了“立象以尽意”。这就是中国哲学注重义理性的意象思维,它属于人的悟性思维。随后,中国传统哲学的悟性主义思维方式在儒家的“格致”、道家的“玄览”和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悟性理论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和鲜明。儒家的“格致”学说对后世影响很大,所谓“格”即“标准也”,所谓“格物”就是用既有的思维尺度去衡量对象。这种判断和衡量与其说是理性主义的,不如说其更具有悟性特色;“玄览”理论概括了道家的根本思维方式,它是通过心从最超验的层次对事物的一种整体性的观照和透察;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凝聚了中国乃至东方悟性思维

收稿日期:2004-12-18

作者简介:俞珏(1981-),女,汉族,安徽庐江人,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的精华,通过清静安宁的心去“了悟”、去觉悟真理实相。沿着这条文化发展道路,中国重直觉的悟性思维模式逐渐巩固下来。另一方面,西方人认为整个知识和文化的基础是理性思维。早在古希腊,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就强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建立了物理学、生物学、逻辑学等一系列科学系统;14世纪至16世纪,文艺复兴为理性思维和自然科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随后17世纪至18世纪,启蒙运动第一次颂扬了逻辑和理性,对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这些历史和文化的因素,西方偏逻辑的理性思维模式逐步确立。

这两种思维模式具体的不同之处是:西方关注的是成就人的生命活动价值,完成人性的生存使命,走上概念化的逻辑思辨之路;中国关注的是完善人的生命本性,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由此中国发挥了注重义理性的悟觉思维。^[2]更具体一点来说,传统西方文化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讲求“知物”以满足生命、实现价值;而“道”是中国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审美观等的根源。中国讲求“悟道”是为了圆满生命、完善人格。“知物”需要用“眼”去看,是以主体与客体、人性与物性分离为前提的;“悟道”需要用“心”体认,是以主体与客体、人性与物性融通一体为基点。在不同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中西方通过不同的途径感知世界。

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对各自的语言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西方人注重语言的逻辑和语法,他们的语言以形式化和逻辑性为特征。以英语为例,英语属于屈折性语言,被连词、介词、冠词、格位变化、动词时态等束缚在逻辑和语法框架内。而汉语属于孤立性语言。人们认为中国从未发展出一套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可以说,在与西方文化相遭遇以前,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一种没有逻辑、没有语法的文化。^[3]由于悟性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发展语言的逻辑功能和形式化特征,导致中国语言文字无冠词、无格位变化、无动词时态、少用或不用连接媒介。因此汉语比逻辑性较强的屈折性语言(如英语)更易于打破、摆脱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等。下面笔者将从字形、词汇、句法、篇章四个层面进行对比,分析不同思维模式对汉语和英语的影响。

二、从字形、词汇、句法、篇章四个层面分析中西方思维模式对汉语和英语的影响

1. 字形层面

在字形层面,笔者主要通过中国汉字和英文字母的形态对比,反映中西方不同思维模式对各自字形的影响。

中国人重直觉、重整体。在这种悟性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他们倾向于用汉字的形状来表达字义。如“益”就是由“水”和“皿”组成,综合了它们的结构表示水从器皿中溢出的意思。这种汉字的构字特点正反映了汉民族思维方式的重直觉、重整体的特征。^[4]

理性思维模式在西方拼音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Rebus书写方式是以画代词语或词语音节的书写规则,它是用表示语音的符号取代表示实体的符号的转换规则。随之出现了音节书写法,根据这个法则,一系列符号被用于取代各个音节的读音。这种音节书写法到距今三、四千年的腓尼基人时代发展为一个成熟的体系。随后希腊人继承了腓尼基人的音节书写法,并且将其发展成为读音和符号完全一一对应的文字书写法则。从希腊人开始,字母表通过罗马人传播到欧洲其它地区。西方人相信绝对原则,认为从逻辑上就能推论和演绎一切存在来。于是这种沿着理性之路发展成形的字母书写系统,不仅大量削减了书写体系中所需的字符数量,而且发展成为读音和符号完全一一对应的书写系统,反映了西方严谨的理性思维。

总之,由于中西方不同思维模式的影响,中国保持了用符号指代文字意义的表意文字系统,而西方发展成为用符号指代语音的表音文字系统。

2. 词汇层面

亲属称谓语是英汉词汇差异最显著的方面之一,其差异也反映了中西方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因此笔者在词汇层面将重点比较英汉亲属称谓语的差异。西方人沿袭逻辑和理性之路,把自我看作是与其他人、与整个世界分离的独立整体,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对待其他人。16至18世纪,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思想的影响,新兴的资产阶级将理性主义作为他们的思想武器。这个理性主义时代宣扬了自由的重要性的和人的平等。因此西方人严格区分自己与其他人,其中包括家人。他们并不重视家庭这个概念,反映在语言上就是缺少亲属称谓语,甚至男女不分,长幼无别。另一方面,中国人继承重直觉的悟性思维,他们把事物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他们将自己和自家人视为一体,以区别于自家人以外的其他团体和陌生人。这种思维模式在儒学和封建制度下不断得到加强,反映在语言上就是:汉语中的亲属称谓向来区分得很严很细,男女有别,长幼有序。^[5]所以汉语中亲属称谓语名目繁多、自成系统,远远多于英语中的同类词。下面的表格就能清楚地反映一些事实。(见表1)

3. 句法层面

英汉句子结构最重要区别在于英语重形合(hypotaxis),汉语重意合(parataxis)。^[6]所谓“形合”,指借助语言形式手段(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

表1 汉英亲属称谓对照表

汉语亲属称谓语	英语亲属称谓语
祖父(母)外祖父(母)	Grandfather (Grandmother)
父	Father
母	Mother
哥哥,弟弟,兄弟,弟兄	Brother
姐姐,妹妹,姊妹	Sister
伯父,叔父,姑父,舅父,姨父	Uncle
大伯子,小叔子,内兄,内弟, 姐夫,妹夫	Brother-in-law
大姑子,小姑子,大姨子,小姨 子,嫂子,弟媳妇	Sister-in-law

手段)实现词语或句子的连接;所谓“意合”,指不借助语言形式手段而借助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连接。前者注重语言形式上的接应(cohesion),后者注重行文意义上的连贯(coherence)。

西方人沿袭了偏逻辑的理性思维,表现在语言上即强调形态的外露和形式上的完整,因此英语使用的形合手段远比汉语要多。英语造句常用各种形式手段(如关系词、连接词、介词及形态变化等)连接词、语、分句或从句,注重显性接应(overt cohesion),侧重句子形式,注重结构完整和以形显义。英语句子千差万别,但可以归纳为7种句型:SV, SVO, SVC, SVA, SV_oO, SVOC, SVOA。综观这7种句型,我们发现SV机制是7种句型都具有的,即主谓一致最集中地体现了英语在形态和结构上的严格要求。英语的主语和谓语不可或缺,而且必须保持一致,反映了西方人强调严谨形式,崇尚理性思维。凭借SV机制,我们能对任何复杂的英语句子,迅速找到它的主干,从而建立起句子的基本格局。其它短语和从句尽管很复杂,但它们在句子中的作用只相当于一个词,一般对句子的基本格局没有影响。因此,不管一个英语句子多复杂,都可以纳入上述SV机制统领的几个句型框架里。如:

(1)The only fruit of the combination of industry and the rarefied atmosphere of learning is the dust in the streets, and a pathetic sense of being lost which hangs over some of the colleges.(Roger Pilkington: Thames Waters)

(基本句式是SVA)

(2)When anyone opens a current account at a bank, he is lending the bank money, repayment of which he may demand at any time, either in cash or

by drawing a cheque in favour of another person.(Gordon Barrie and Aubrey L. Diamond: 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Law)

(基本句式是SV_oO)

(3)When, for example, a customer first opens an account, he instructs the bank to debit his account only in respect of cheques drawn by himself.(ibid)

(基本句式是SVO)

中国人继承了重直觉的悟性思维,语言上的表现是意合。汉语造句少用甚至不用形式连接手段,注重隐性连贯(covert coherence),注重逻辑事理顺序,注重功能、意义,注重以神统形。^[8]汉语没有英语常用的关系代词、关系副词、连接代词和连接副词;介词和连词常常省略;没有词的形态变化。总之汉语重意合而不重形合,词语之间的关系常在不言之中,语法意义和逻辑联系常隐含在字里行间。因为汉语不存在形态,所以汉语的句子不必遵循主谓一致这个形态要求,即汉语的句子不存在一个主干结构,也没有主干和枝杈之分。更具体地说,首先,汉语中有大量的无主语句和主语省略句;其次,汉语中除了有类似英语的动词谓语句,还有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主谓谓语句。这些都反映出汉语重悟性,根据主观的直觉,从上下文中“悟”出关系,摆脱主谓一致等形态框架的束缚,只要文意贯通、脉络清晰即可。如:

(4)值得骄傲的是我们中国有好马。(周涛《巩乃斯的马》)

(无主语句)

(5)俗话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峻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主语省略句)

(6)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朱自清《绿》)

(动词谓语句)

(7)刘备,天下枭雄。(罗贯中《三国演义》)

(名词谓语句)

(8)春风浩荡,秋雨滂沱。(峻青《秋色赋》)

(形容词谓语句)

(9)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郁达夫《故都的秋》)

(主谓谓语句)

4.篇章层面

Kaplan认为,篇章的组织方式具有语言和文化特殊性,反映了人的思维模式(thought pattern)。通过对篇章的语义结构和组织方式的分析,我们有可能找出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所习惯采用的不同思维模式。

在理性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英语篇章的组织

发展呈直线型。一个英语段落通常以一个主题句开头,直截了当地点明这一段落的中心思想,然后在以后各句中通过说明和举例不断发展这一中心思想。这种直线型的篇章组织方式真实地反映了西方人直截了当、开门见山的理性思维模式。如:

(10)The old view of Galileo was delightfully uncomplicated. He was, above all, a man who experimented, who despised the prejudices and book learning of the Aristotelians, who put his questions to nature instead of to the ancients, and who drew his conclusions fearlessly. He was the man who climbed the Leaning Tower of Pisa and dropped various weights from the top, who rolled balls down inclined planes, and then generalize the results of his many experiments into the famous law of free fall.(Michael Hoskin: Galileo Reborn)

与此相反,受悟性思维模式的影响,汉语典型的篇章发展呈螺旋型。篇章的主题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的方式,而是采用迂回的方式从许多看似无关的角度来阐述主题。这种螺旋型的篇章组织方式十分间接和含蓄,让西方人难以适从。例如:

(11)看见陈年风筝缠在树梢或者电线杆上,你该作何感想?它们残破了,褪去了往日斑斓的色彩,只因它有太长的引线。这使它变得缠绵悱恻,难以毫无牵挂地飞向云空。被世间之物所缠所累,这或许正是它的苦处,也是它的动人之处。不妨说,这些残破褪色的风筝,是我们关于这个世界最朴素而动人的记忆之一。当然,这样的记忆不需要任何回忆。它直接在那儿,在当下的现场,有风照看着它。

(苍耳《风筝引》)

综上所述,汉英两种语言在各个层面表现形式

的差异绝不是孤立的、任意的,这些差异的理据来自语言的深层机制——思维模式。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理解汉英种种语言现象时,弄清汉英思维模式的差异显得极为重要。本文从字形、词汇、句法、篇章四个层面分别探讨了思维模式对汉语和英语的影响,以期对理解汉英不同的语言现象有所裨益。此外,笔者只是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方面来分析思维模式对语言的影响,若进而从中西方思维模式的沟通和融合方面来谈其影响,将对语言的研究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 [3]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88.
- [5]陈昌义.日常英语和英格兰民族[A].顾嘉祖等编.语言与文化[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 [6]陈定安.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 [4]蔡镜浩.汉语与中国文化[A].顾嘉祖等编.语言与文化[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 [2]高清海.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特质及其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02,(1):52-55.
- [1]侯才.论悟性——对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和特质的一种审视[J].哲学研究,2003,(1):27-31.
- [8]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7]刘宓庆.汉英对比与翻译[M].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
- [9]许余龙.对比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吴惠敏

(上接第93页)为师,德高为范”,教师的完美人格是任何教科书、任何道德箴言、任何惩罚和奖励制度都不能代替的一种教育力量,它对学生成长起着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五,当代道德人格的培养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道德人格的培养作为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对青年学生来说,学校是道德人格养成的重要场所。但是,道德人格的培养不可能离开家庭、社会,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影响。“一个分清善恶、正邪、荣辱的社会氛围,能够净化人们的灵魂,激活人们的思维,提升人们的境界。”^[8]因此,在当前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和文化建设,提高全社会公民道德,营造一个良好的道德氛围,是培养青年学生道德人格的一个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许金声.走向人格新大陆[M].北京:工人出版社,

1988.

-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V.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李虹.世界各国道德教育的走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51-54.
- [4]彭小虎.论创新教育的三个层次[J].教育科学,2001(2):78-81.
- [5]刘铁芳.从“教育关怀”到“素质关怀”[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2):97-101.
- [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183.
- [7]钱逊.对青年学生进行做人的教育[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2):16-23.
- [8]姜建成.论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道德选择[J].道德与文明,2002(2):31-34.

责任编辑:欧元雕